

郭汉民 著

中国近代史事探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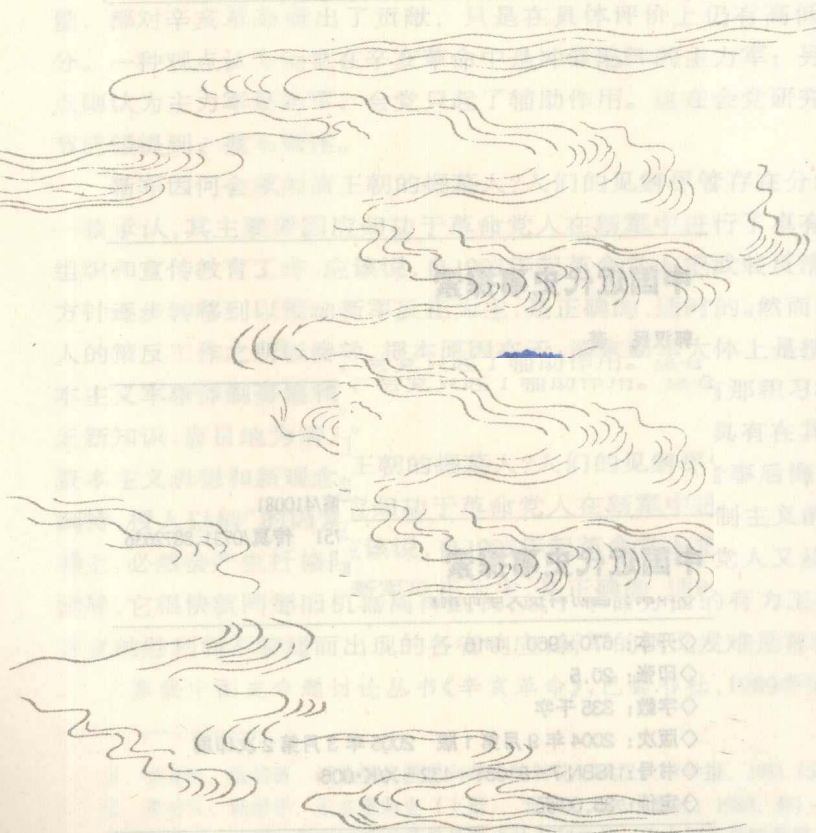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郭汉民 著

中国近代史事探索

◆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代史事探索 / 郭汉民著.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6

ISBN 7-81081-432-X

I. 中... II. 郭... III. 中国—近代史—考证
IV. K2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42848 号

中国近代史事探索

郭汉民 著

◇责任编辑: 黄 林

◇责任校对: 全 健

◇出版发行: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长沙市岳麓山 邮编/410081

电话/0731.8853867 8872751 传真/0731.8872636

◇经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刷: 国防科技大学印刷厂

◇开本: 670×960 1/16

◇印张: 20.5

◇字数: 335 千字

◇版次: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书号: ISBN 7-81081-432-X/K·006

◇定价: 35.00 元

自序

中国近代史事浩如烟海，错综复杂，曾引起为数众多的史学工作者和史学爱好者去探讨，去求索，去寻个究竟，笔者即是其中之一。引领我到这块史学园地来的，是我的先师林增平教授。

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整个家族世代务农，不曾出过一个文人，多亏长在新中国，我才有幸成为这个家族的第一个大学生。在我这里，既无家学渊源，又无过人才智，只有求真务实和吃苦耐劳的品性。1963年我考入中山大学历史系，史学大师陈寅恪及史学家刘节、梁方纵、梁钊韬、金应熙等都在那里任教。但在当时的时代氛围中，我们并不十分了解这些学者们的崇高价值，也没有及时向他们虚心讨教。今天想来，实在追悔莫及。从大一到大三，我参加了“小四清”和“大四清”，后来又卷入“文化大革命”，荒废了许多永远无法挽回的宝贵光阴，没有读多少书，更谈不上史学研究了。离开中山大学，先到部队农场劳动锻炼，后在海南岛五指山区做基层工作，历时十余年，当过“伙头军”、中学教师、县教育局教研员、县委宣传部干事等，有可以自信的生活能力和工作能力，而史学研究的能力则只能用“阙如”来表示。

值得庆幸的是，1980年我考取了湖南师范学院（1984年更名为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师从当代著名史学家林增平教授攻读中国近现代史硕士学位。从那时起，我才开始逐步走进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园地。20世纪80年代初，思想解放的阳光雨露使这个园地百花盛开，令我目不暇给。我像一只不知疲倦的蜜蜂，在百花丛中穿梭，努力吸吮营养，填充久遭“知识饥荒”的肚肠。在林先生的指导下，我一边努力阅读，一边开始做些探索性的工作，逐步培养自己的史学兴趣和研究能力。在三年研究生期间，除完成《论

康、梁异同》的硕士论文外，还先后撰写并发表《辛亥革命时期湖南会党的性质与作用》、《辛亥“三·二九”之役陈竞波非侦探辨》、《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等论文。1983年我毕业留校任教。

大学是研究学术的殿堂。教师在搞好教学的同时，必须努力研究学问，教学、科研如同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基于这种认识，我一方面努力做好教书育人工作，承担了大量教学任务，并尽心尽力去做；另一方面潜心学术研究，甘坐冷板凳，肯下死功夫，以勤补拙，艰苦探索。我协助林增平先生编撰《清代人物传稿》下编（是为国家“六五”规划历史学重点课题），撰稿、组稿、改稿，历时10年，然后又襄助吴雁南先生完成国家“八五”重点课题“近代社会思潮研究”，参与主编四卷本《中国近代社会思潮》（1840—1949）。在教学和研究过程中，我把有关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心得写成文章，陆续发表，计有100余篇。近来，我把其中的一部分分类结集，计有《晚清人物研究》（与章育良合作）、《中国近代思想与思潮》、《湖湘人物论丛》和本书《中国近代史事探索》。

如前所述，中国近代史事浩如烟海，以我极其有限的能力和精力实不足以涉猎其万一。究其实际，本书不过是我对近代中国极少一部分史事所作的一点点探索而已。

这个论文集由六组论文构成。

第一组文章是对中国近代史、晚清史的宏观考察。中国近代史既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与中国封建势力互相勾结，给中国人民带来苦难的历史，又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独立、民族解放和国家富强的奋斗史，还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先进志士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争取社会进步的求索史。这样一来，中国近代史除人们熟知的“两个过程”外，还凸显了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这样一条基本线索。近百年来，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富强，从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曾坚持不懈地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中国军民曾同外国侵略者展开过一次又一次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曾与封建势力进行过前仆后继的反抗斗争；而作为中国合法代表的历届中国政府也对外国侵略势力作过不

同程度的抗争，进行过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和社会的改革。所有这一切，形成了推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合力。其中，改革与革命则是最主要的动力。发生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旧式农民战争——太平天国运动则以其客观后果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晚清政治的变革。这一运动打乱了清王朝高度专制的统治秩序并使之偏离了固有的轨道，引发了晚清政治中中央与地方、革新势力与守旧势力以及满汉之间的矛盾，为既是地方势力、汉族官僚，又是统治阶级内部革新势力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袁世凯等这样一批人物登上历史舞台提供了契机，他们与不同程度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社会势力相结合，推进社会改革，经过洋务、维新与清末新政及预备立宪，为辛亥革命的发动准备了历史前提。以孙中山为领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正是在这一历史前提下创造了推翻清朝、建立共和的伟大功勋。

第二组文章是对晚清具体政策的探索，包括教务政策、留学政策以及首批留学生的派遣。

第三组文章是对近代中国诸多史事的微观分析，既有对建国以来中国近代史事、史籍考订成果的评述，也有对同盟会非团体联合、唐才常入两湖书院时间、辛亥“三·二九”之役陈竞波并非侦探以及“左公柳”纪实诗文句的考证。

第四组文章是讨论近代湖南人才群体及其精神，评析近代湖湘文化的爱国传统。

第五组文章是对史学研究的一些思考，认为历史研究应侧重考察人的发展过程，把研究的视角从群体与社会转向真实的、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个人，建构历史人学；主张历史研究要努力与社会现实契合，要尽可能地贴近社会生活。对于戊戌变法活动的研究，则主张把眼界放得更开阔一些。实际上，对整个近代史的研究，都应开阔眼界，以更加求实和开放的心态加以审视。

第六组是有关辛亥革命的研究论文和研究成果的评述。《列宁论辛亥革命》是10年前我所写的一篇未曾发表的文章，是我学习经典作家思想的一点体会，其他几篇是我对辛亥革命一些问题的思考。关于辛亥革命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讨论，虽属研究综述，但亦系本人辛勤探索的一部分，且由于

所含学术信息较多，对于初学者亦有参考价值。

本书所收录的论文，大都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光明日报》、《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湖南师范大学学报》、《湖北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等报刊上发表过。其中有七篇先后被《新华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和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出版工作》、《宗教》所转载。《太平天国与晚清政治》曾获湖南省第三届社会科学成果优秀论文奖。

今年是我研究生毕业 20 周年，是先师林增平教授诞辰 80 周年，将这批论文结集出版，聊作一个纪念，亦含有个人敝帚自珍之意。

为了这本小书的出版，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室主任黄林同志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湘潭大学提供了出版资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郭汉民

2003 年 11 月 30 日于湘大北山

目 录

◆近代中国改革与革命述论	(1)
◆太平天国与晚清政治	(13)
◆苦难·奋斗·求索 ——中国近代史三题	(27)
◆清政府与近代中国教案	(46)
◆论甲午战前的晚清留学政策	(57)
◆曾国藩与近代中国首批留学生的派遣	(65)
◆建国以来中国近代史实考辨成果述要	(74)
◆关于“左公柳”纪实诗的考证	(130)
◆唐才常入两湖书院时间考实	(133)
◆同盟会非“团体联合”史实考	(137)
◆辛亥“三·二九”之役陈竞波非侦探辨	(147)
◆近代湖南人才群及其精神	(152)
◆清末湖南维新派革新政治以御侮	(159)
◆近代湖湘文化的爱国传统	(165)
◆放开眼界看“戊戌”	(175)
◆让历史研究更好地与现实契合 ——评《近代中国经济政策演变史稿》	(177)
◆论历史人学的建构	(180)
◆列宁论辛亥革命 ——纪念列宁逝世 70 周年	(188)
◆试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	(202)
◆同盟会成立刍议	(214)

◆从“三·二九”到“八·一九” ——辛亥两役之比较	(221)
◆辛亥革命时期湖南会党的性质与作用	(229)
◆辛亥革命在湖南	(240)
◆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历史回顾	(249)
◆辛亥革命性质与下限	(267)
◆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	(272)
◆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	(289)
◆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团体	(293)
◆辛亥革命时期的会党	(306)
◆辛亥革命时期新军的性质与作用	(315)

近代中国改革与革命述论

从 1840 年英国的大炮轰开旧中国的大门开始，到 1949 年毛泽东向世界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为止，近代中国社会经历了深刻的变化，近代中国实现了巨大的历史性飞跃。

近代中国的 109 年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 109 年，是志士仁人为寻找救国真理不断探索的 109 年，也是中国人民为反帝反封建奋斗不息的 109 年。在这个过程中，自下而上的革命与自上而下的改革几乎交替进行，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意义最为深远的社会革命，推动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变化和历史的发展。

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处在满清王朝的专制统治之下。这个由满州贵族入主中原所建立的封建王朝虽然有过的“康乾盛世”，但在世界范围内却早已落后于时代潮流。在满清王朝建立之后不久，西方已开始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当时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随后又经过了工业革命的洗礼，彻底摧毁了旧社会的基础，实现了社会的全面变革。“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①它将消灭以往自然形成的各个国家的孤立状态，消灭各民族原先闭关自守状态所赖以存在的生产方式，把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变成世界性的。这种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最早在英国确立起来。

当英国资产阶级企图以廉价商品为重炮轰开中国大门的时候，清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55 页

王朝已从“康乾盛世”的鼎盛状态中跌落下来，进入了危机严重的衰世。中国社会在与西方文明接触的时候，仍在旧的体制中缓缓运行。这种体制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以血缘关系与地缘组织相结合的宗法制度，儒家思想为这一体制提供意识形态保障，科举取士制度为地方士绅提供了进入官僚体系的途径。这种旧体制经过长期运行已臻于完善。如无来自外力的强大冲击，这种体制很难发生变革，即便发生改朝换代，整个社会仍然还会在旧的体制下继续运行。

鸦片战争是来自西方世界的第一次强大冲击。“中国皇帝为了制止自己臣民的自杀行为，既禁止外国人输入这种毒品，又禁止中国人吸食这种毒品（鸦片——引者注），而东印度公司却迅速地把在印度种植鸦片以及向中国私卖鸦片变成自己财政系统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半野蛮人维护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发财的原则来对抗。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①从鸦片战争开始，维护道义、反抗侵略的中国由于自己的孤立无依被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只能代表落后于世界潮流的“陈腐世界”，而一意发财的西方列强则恰恰是最现代社会的代表者。道义与落后、赚钱与先进如此奇妙地结合在一起，成为近代中国悲剧的根源。为了结束这场悲剧，中国必须尽快从“陈腐世界”中走出来，改变落后状况，追赶世界潮流。

马克思指出：“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开始建立起联系。”“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

^① 马克思：《鸦片贸易史》，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6页

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①显然，鸦片战争不仅是近代中国悲剧的开端，也是结束旧中国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状态的开端。从此，中国面临着两大历史课题：一是反抗侵略，维护自己国家和民族的主权；二是打破封闭，学习先进，追赶世界潮流，实现国家富强。在这两大历史任务面前，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各种政治派别和各种政治倾向的人们都要作出自己的回答；历届中国政府的合法性都要受到它们的严格检验。

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富强，从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曾坚持不懈地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中国军民曾同外国侵略者展开过一次又一次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曾与腐朽的、卖国的反动统治者进行过前仆后继的革命斗争；而作为中国合法代表的历届中国政府也作过不同程度的抗争，进行过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社会的改革。所有这一切，形成了推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合力。其中改革与革命则是最主要的动力。

改革与革命都是通过对社会各种权力、利益和资源的分配与再分配，实现新旧制度的转变，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实现社会的进步。但是，两者所采取的方式却又大相径庭。改革是一种政府行为，是国家政权实体通过政策的调整，兴利除弊，实现权力、利益和资源在社会各阶级、阶层、成员之间的分配与再分配，以达到新制度取代旧制度或一种制度自我完善的目的。改革一般来说是自上而下的、和平的。革命则是用暴力打碎旧的上层建筑，用暴力夺取国家政权以及伴随国家政权更迭而产生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秩序的巨大变化。这种类型的革命的目的是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秩序，因此政治权力的更替虽然是其最显著的标志，但它更是一场意义深远的社会革命。与改革不同，革命更突出地表现为自下而上，表现为激进与暴力。在人类发展史上，改革与革命是相互关联的。在社会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改革与革命往往互为因果。首先对现有体制或社会现状提出改革要求的，通常是一部分具有改革思想、维新倾向、务实精神的社会上层人士和知识精英。一旦这部分人的思想主张影响到了政府的决策，并促使政府采取一定程度的改革措施，改革就转化成为政府行为，成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变革过程。然而，对改革的倡导往往会激发

^①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3页

起人们对改革寄以更多、更大、更高的奢望。这样就有可能导致整个社会特别是上层社会的分裂，造成政府对国家控制能力的下降，并为主张推翻现行制度的革命者提供发展壮大的机遇。如此，改革就成为了革命的前奏。然而，革命是否会爆发，还取决于改革派、守旧派和革命派之间的力量对比，取决于旧制度对改革的适应能力。如果改革派的力量远远超过其他两派的力量，旧制度又具有相当强的适应能力，那么改革即使是引发了革命，这种革命也仅是为争夺国家统治权力所触发的短暂的政治斗争。随着政治秩序的恢复，社会各方面的改革将有条不紊地进行，最终达到彻底变革旧制度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改革不仅是革命的前奏，也是革命的结果，改革承担起了社会革命应承担的任务。如果保守派的力量十分强大，旧制度又缺乏应有的适应能力，改革就有可能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当改革既无力革除旧制度的弊端，又无力缓和日趋激化的社会矛盾时，整个社会舆论将更趋向于革命，革命派的力量也将日渐壮大。革命派号召广大民众起来推翻旧制度，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体制，一场自下而上的革命随时都将爆发。如是，革命就是改革受到壅塞时的溃决。这样，改革不仅导致革命的爆发，而且改革本身也成为了具有更为广泛意义的社会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革命并不总能达到革命者预期的效果。旧制度的顽强抵抗也可能使革命遭到挫折，甚至是失败。但是，只要旧体制内的导致革命发生的因素没有被消除，只要改革运动仍步履维艰，困难重重，那么革命总会在适当的时候重新爆发，且通过再次或数次的革命最终推翻旧制度。与此同时，虽然革命在突破旧制度的顽强抵抗、为制度的变迁提供前提条件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但是摧毁一种制度和建立一种制度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一种制度被打破后，建立并最终确立新的制度却是一项漫长而又艰巨的任务。由于通过革命建立起来的新制度自身还存在着许多不够完善的地方，新制度的优越性无法充分体现出来，旧制度的各种残余因素还没有彻底根除。如此，新制度需要有一个不断改进和完善的过程，而这一过程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来完成。由此观之，旧制度中的改革引发了革命，而成功的革命又是新一轮改革的起点。

总之，在社会发生变革的关键时期，改革与革命往往互为因果。改革是革命的前奏，革命是改革的结果，同时又是新一轮改革的开始。改革与革命如此相互促进，导致新制度逐步取代旧制度。在这样

一种关系链中，革命无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往往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因素。但是革命也并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而且它产生的副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诸如革命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和强大的破坏性。因此，有人主张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应尽力避免用革命的手段而希望通过和平渐进的改革来达到变革社会体制的目的。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当然属于最佳选择。但是，选择改革或革命并不是依靠人们的想像力，也不是取决于人们的好恶。各国经历改革与革命之路除取决于改革派的力量和旧制度的适应能力之外，它还与各国的文化传统，以及导致变革的各种因素和变革的内在动力等因素紧密相连。所以，改革与革命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如果单凭情感的冲动，或为某种政治目的就以改革来否定革命，或以革命来否定改革，那都是对历史的歪曲。

中国近代的百年历史雄辩地证明：改革和革命共同促进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共同推动着中国社会的进步。

二

鸦片战争的爆发，西方殖民者利用坚船利炮野蛮地打开了中国的门户，长期闭关自守的中国被迫逐步地向世界开放。统治中国的满清王朝，除了要对付西方列强的侵略之外，更面临着一场严重的国内危机。19世纪40年代尖锐的社会阶级矛盾，终于触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洪秀全利用西方的基督教来反对孔孟之道，冲击着传统体制的重要精神支柱——儒家思想和传统的伦理道德，因此，这场运动从一开始就具有很强的革命性。然而，由于太平天国自身的缺陷特别是农民的局限，使它无法用新秩序来改变旧传统。“天京事变”之后，太平天国与满清王朝的斗争实际上已经蜕变为两个对立的封建政权之间的战争。太平天国运动虽然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及自身的蜕变之下失败了，但是它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有组织、有纲领并以夺取全国政权为目标的农民起义，也是中国人运用西方的思想武器，反对中国的传统思想、改革中国传统制度的首次尝试。

当学习西方、“师夷制夷”已成为时代潮流，并逐渐在先进中国人中形成共识时，19世纪60年代，面临着严重内忧外患局面的清政府，开始在被后人称为“洋务派”的开明务实的官僚支持下，推行以引进西方先进设备、技术兴办近代军用、民用企业为中心内容的，以

“自强”、“求富”为目的的“自强新政”。在此后的30多年中，中国开始出现了新式企业、近代交通运输业、海军海防和近代意义上的教育、科技事业。翻译西方书报和派遣留学生也在这个时期开始进行。“自强新政”是近代中国最早的社会改革，它引进了大机器生产和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促成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初步兴起，为中国的近代化开了先河。“自强新政”的不断深入还促使了社会思潮的转变和新价值观的产生，并孕育产生了早期维新思想。但是，洋务派坚持“中体西用”，试图将西方的科学技术嫁接到中国传统体制之上，这种努力因甲午战争的惨败而遭遇挫折。

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转折点。清政府在战争中的失败以及接踵而来的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使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严重，促使自19世纪80年代初开始出现的维新思想，迅速发展成为一种强大的社会思潮，维新变法的呼声日益高涨。在维新思潮的推动下，手中缺乏实权而又不愿做亡国之君、力图有所作为的年轻皇帝依靠维新派的支持，诏定国是，发起变法维新运动，进行自上而下的范围广泛的改革。光绪皇帝雪片一般的变法上谕使人们的思想获得了空前的解放，却又激化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在很短时间内庞杂的变法条令使人们眼花缭乱，连趋向改革的洋务派也大都意存观望，更增添了社会的一种恐慌情绪。当变法运动陷入到帝后党争的漩涡之后，又遭到守旧势力的拼死反对，其失败也就不可避免了。戊戌变法的失败不仅使维新派遭到镇压，也使洋务派受到了打击，清政府进入了最反动的统治时期。守旧势力昧于世界大势，力图闭关自守，他们利用民众的反帝情绪，煽动盲目排外，以致酿成庚子国难。此后，守旧派代表人物从中央到地方都受到了致命的打击，统治阶级内部的革新势力则取得了明显的地位和权力，成为清廷的重要支柱和继续推行改革的中坚力量。这样，曾经镇压戊戌变法的慈禧也不得不改弦更张，推行变法新政。新政所涉及的内容比“百日维新”远为广泛，是清政府推行的一场规模空前的改革运动。在这场改革运动中，获得的最大成就是废除了上千年的科举制度，从而除去了传统体制的一个重要支柱，使新式教育在全国逐渐得到推广，新的教育体系得以确立，留学教育也得到迅速发展。这不仅进一步改变了人们的价值取向，传统体制遭到进一步瓦解，而且也使改革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其次是编练新军，促使军队的近代化。由于清末编练新军的权力掌握在地方督抚手中，地方分离主义趋向因此有所加强。新军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不断

提高，不仅成为了革命的温床，而且也为以后的军阀政治开启了方便之门。清政府对近代工商业的政策也有了重大变化，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倡导和奖励近代实业的发展，从而在政府行为上根本改变了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清政府还在司法、行政、外交、财政等方面实行了改革，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1904年日俄战争日方的胜利，以及来自国内外各方面的压力，迫使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开始改革传统政治体制。立宪派借此契机，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国会请愿运动，企图通过和平的方式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与此同时，立宪派与清政府在立宪的步骤、咨议局和资政院的权限、国会召开时间等一系列问题上日益加深的分歧，造成了两者之间的严重对立，从而为以后立宪派倾向革命埋下了伏笔。立宪运动虽然得到了社会上相当程度的认同，但是不同的利益集团对立宪所抱有的企望却完全不同：朝廷旨在消弭革命，皇位永固；地方督抚是为了保持并扩大自己的既得利益和特权；地方士绅为的是使地方自治合法化。他们都以支持立宪为幌子，谋取私利。如此，一方面现代立宪政体无法建立起来，另一方面传统社会体制的分裂将进一步加剧。

总之，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使政府组织具有了现代国家的雏形，它促进了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它是19世纪中期以来各种社会改革的延续与发展，但并不是结果。正如法国学者托克维尔所说：“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①自19世纪中期洋务派以“求强”、“求富”为口号实行改革以来，虽然清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适应发展的需要，但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两大艰巨任务——救亡和强国，清政府连一项也没有完成好。20世纪初的中国比19世纪中期的中国国力更孱弱，民族危机更深重。这样，清政府的合法性自然会受到质疑。清政府改革的成就也为革命提供了必要的条件。通过改革，出现了一个更为开放的社会，与外界接触的机会更多，对西方的了解也更深，传统的天朝上国的观念逐渐发生变化，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等等的传入，也为社会的变革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武器。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经济近代化的推进，产生了并逐渐发展着两大新兴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就为新的社会革命奠定了阶级基础。

① [法]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20页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的出现，意味着一支全新的政治力量开始崭露头角，他们是 19 世纪中期以来中国社会改革以及西方影响不断扩大的产物。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是这一时期最具革命精神和时代特色的纲领，他本人也以其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而成为民主革命的伟大旗手。革命派在传播革命思想和发动革命斗争上做出过重大贡献，但其自身存在着许多严重的缺陷。其一，革命派的基地大多集中在海外和通商口岸，与内地下层民众的联系较少，社会基础相当薄弱。其二，革命派从来就不是一个统一的坚强的政治团体。除反对满清政府外，革命派内部在许多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因此，当辛亥革命爆发后，革命派虽能很快担当起领导的职责，并为民国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但却无力控制革命的进程，只能与前清官员、立宪派达成妥协，最后把权力拱手让给了袁世凯。

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和议会民主制的实验，随着宋教仁被刺杀而烟消云散。这一事实充分说明西方的民主政治模式不应当时的中国国情。关于这一点，孙中山和梁启超早已认识到了。孙中山在宪政实行之前设立了一个训政时期，梁启超认为在实行民主政治之前，要有一段时期的开明专制。问题在于由谁来领导两者之间的过渡，以及如何实现这种过渡。

袁世凯执政后企图以恢复帝制来解决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结果以失败而告终。民国初年的政治实践证明：传统的君主制已落后于时代发展的需要，而要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君主制如同建立议会民主制一样不符合国情，共和制就是在这种尴尬的处境中得以保存的。北洋政府挂着共和制的招牌，肆意践踏共和制的原则。尽管还有少数人为共和主义理想而奋斗，然而共和主义的实质已在中国政坛上荡然无存，中国开始走向极权主义政治。

辛亥革命取得了胜利，统治中国达 260 多年的满清王朝和两千多年的帝制在革命中轰然坍塌，在悠久的文明古国里终于确立了共和制。这是一次伟大的历史飞跃。但是，辛亥革命并没有解决中国所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救亡与强国的理想远未实现。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讲，共和制只是在表面意义上建立起来了。辛亥革命并不是一场彻底的、成功的革命，它只是对 1901 年—1911 年清末改革运动时期反映出来的各种社会矛盾和斗争的一个总结。